

中国教育通史

第 六 卷

毛礼锐 沈灌群 主编



21185085

山东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顺华
封面题字：启 功

中国教育通史

第 六 卷

毛礼锐 沈灌群主编

★

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5.25印张 5插页 342千字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890

ISBN 7-5328-0652-9/C·547

定价 6.10 元

前 言

我们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中国素以“文明古国”、“礼义之邦”著称，这和中国历来重视教育的建设和发展是分不开的。中国教育的发展源远流长，形成了许多独具的特点和优良的传统，涌现出众多的教育思想家和实践家，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对促进中华民族学术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对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推动中华民族的兴旺和进步，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教育，包括科技教育曾居于世界领先的地位。近百年来，虽多次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曾使中国教育蒙受挫折而一度落后，但经过中国人民和许多有胆有识的教育家的顽强奋斗，锐意改革，又创建了新的功绩，积累了新的经验。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步把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同中国的教育实际密切结合，开创了中国教育发展的新局面。

中国教育有许多独具的特点和优良的传统，例如，在古代，中国始终高度重视教育的作用；中国教育不受任何宗教的控制和影响，使中国没有成为一个宗教国家；中国教育坚持以统一的语言文字进行教育和教学，在少数民族地区，一方面帮助少数民族创立文字，提倡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教育和教学，同时也积极推广普通话和通用文字，培植共同的民族心理和道德品质；在教育思想上，各个学派相互争鸣、相互吸收，逐步

融合，不断充实和完善；在教育制度上，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并重，官学和私学互相补充，人才培养和人才选拔、任用结合，普通学校和专门学校并存，童蒙教育和成人教育兼顾；在教育内容上，德、智、体、美综合发展，道德、知识、能力全面要求；在教育教学的原则和方法上，强调启发诱导、因材施教、自学自得、循序渐进、长善救失、言行一致；在师生关系上，注重尊师爱生、教学相长，提倡教书育人、论学取友，身教重于言教。又如，在近现代教育史上，既反对闭关自守，又反对崇洋媚外；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又不盲目照搬照抄，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为指导，又强调必须同中国教育实践相结合，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新教育。在这些方面，我们既有失败的教训，又有不少成功的经验。中国教育史上这些宝贵的经验和优良传统，包括失败的教训，已经成为我国文化宝库中的珍贵财富，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并且日益为愈来愈多的世界各国人士所倾心仰慕和竭力取法。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毋庸讳言，中国教育史上也有封建的、殖民主义的陈旧腐朽的东西，理应严肃地批判，认真地加以清除。但就中国教育发展史的总体来看，仍然是精华胜过糟粕，光明大于阴暗，进步多于落后。虽说瑕瑜互见，但总是瑕不掩瑜。因此，对中国教育史采取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悲观主义的态度是毫无根据的，也是完全错误的。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教育发展史，是客观的需要，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这是我们编写这部《中国教育通史》的指导原则和根本出发点。

编写《中国教育通史》，我们将力求在充分占有史料和深入钻研的基础上，努力做到史论结合，思想性和科学性统一，充分体现教育史的专史特点，通过中国教育发生、发展的历史事实，揭示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总结中国传统教育的特点，探索近百年来教育改革的经验与教训，判别精华与糟粕，发扬优良传统，清除陈腐守旧的陋习，以便古为今用，为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科学，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提供必要的条件，作出应有的贡献。

历史是一面镜子。研究和_、学习中国教育史必将大大激发人们，尤其是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爱国热情，增强历史责任感，尽全力为社会和_、人民服务，这也正是我们所竭诚期冀的。

本书规模较大，拟分六卷，约二百四十万字。第一卷为先秦时期的教育；第二卷为秦汉至隋唐时期的教育；第三卷为宋元明清时期的教育；第四卷为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的教育；第五卷为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期的教育；第六卷为建国后三十六年的教育。

全书准备用五年时间，至一九八八年全部出齐。

本书的编写由毛礼锐教授、沈灌群教授任主编，每卷都有专人分工执笔，全书的大纲和定稿是在主编领导下集体讨论确定的，所以说全书各卷都是集体的成果。

编写一部《中国教育通史》在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多年还是第一次，原来全国教育史学界分别编写的《中国古代教育史》、《中国近代教育史》、《中国现代教育史》，以及各种专题教育史，为教育史学科的教学和科学研究都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是应当充分肯定的。今后仍然需要更深入地进行断代的、专题的研究。当前，能有一部通史，对于了解中国教育发展史的全

貌，把握中国教育发展史的基本线索和总的特点，探索中国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是十分必要的。本书的编写，算是一次初步的尝试。

本书为第六卷，也是全书的最后一卷，经过几年的努力，积极创造条件，认真组织编写，终于和广大读者见面了。这一卷包括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发表共36年教育发展的历史。本卷着重探讨了我国（未包括台湾省）在共产党领导下成功地进行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基础上，创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历程和经验教训；充分肯定了建国后改造旧教育，发展新教育的成功经验，指出了由于认识不足出现的失误；以科学的态度分析了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得失，阐明了学习外国经验必须同本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客观真理；认真总结了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期发展社会主义教育的实践经验；深刻地揭露和抨击了“文化大革命”，中在教育指导思想上的重大错误，以及“四人帮”对教育事业的严重破坏及其所造成的巨大损失；扼要地阐述了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教育领域进行拨乱反正、振兴教育的艰苦努力和取得的丰硕成果；满怀信心地展示了教育上改革开放、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决策的确定及光辉前景，也如实地指出教育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面临的艰巨任务。

编写一部新中国教育发展史是一项难度极大的任务，我们在力争翔实地占有材料，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认真谨慎地进行理论分析等方面，虽然作了一些努力，但仍深感差距颇大。在我们伟大的祖国即将跨入第四十个年头的前夕，将此书奉献给读者，如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我们将感到无限欣慰。

本卷执笔者为苏渭昌同志。参加本卷编写提纲讨论、修订和初稿审阅者（按姓氏笔划）有：王炳照、李国钧、赵家骥、韩达、阎国华、郭笙、郭令吾、栢汝莉等。国家教委袁华同志曾给予热情鼓励与支持，提出过中肯的建议。

在主编指导下，由李国钧、王炳照负责统稿定稿工作。韩达同志自始至终参加本书编写的组织工作和部分审稿工作。

本书编写中参考和汲取了许多学者专家的研究成果，除在书中注明外，在此一并致谢。山东教育出版社为本书出版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启功先生为本书封面题字，我们表示衷心地感谢！

本书难免有许多不足、欠妥甚至错误的地方，敬祈国内外学者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八八年五月于上海

目 录

第二十三章 新中国教育的起步与建设

(1949年10月—1966年5月)	1
第一节 接管、改造旧教育	1
一、规定文化教育政策	2
二、接管旧学校	14
三、团结、改造知识分子	38
四、确定教育为工农服务的方向， 改革课程和学制	50
五、进行院系调整	72
第二节 学习苏联教育经验	83
一、确定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方针	83
二、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典型示范	89
三、苏联教育对中国教育的影响	95
第三节 探索中国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113
一、向科学进军与反右斗争	114
二、确立社会主义教育方针	127
三、“教育大跃进”	139
四、制定大、中、小学工作条例	162
五、改革教学与推行“两种教育制度”	173
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87

第二十四章 “文化大革命”对教育的破坏

(1966年5月—1976年10月)	197
第一节 教育事业的停滞、倒退与混乱	197
一、“停课闹革命”	198
二、派工宣队进驻学校	202
三、开展颠倒是非的“大批判”	204
四、残酷迫害干部、教师	207
五、乱揪乱斗高等学校	210
六、盲目发展普通中小学	213
七、进行所谓“教育革命”试点	217
第二节 “四人帮”在教育领域中的倒行逆施	230
一、炮制“两个估计”	230
二、否定基础理论	237
三、批判所谓“右倾翻案风”	245
四、广大教育工作者在逆流中前进	249

第二十五章 教育上的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

(1976年10月—1985年5月)	252
第一节 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	253
一、揭批“四人帮”	253
二、整顿、恢复教学秩序	261
三、初步调整教育事业	270
四、全面、准确评价毛泽东对教育工作 的指示	282
第二节 确定教育是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	288
一、教育本质问题的讨论	288
二、明确教育的战略地位	295

三、进行专门人才普查	300
第三节 “三个面向”与教育改革	308
一、“三个面向”的提出与新技术革命的挑战	308
二、高等教育的改革	321
三、中等和初等教育的改革	356
四、对外教育交流	369
五、全面进行教育体制改革	377
第二十六章 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	
(1949年10月—1987年2月)	396
第一节 高等教育的发展	397
一、普通高等学校	397
二、研究生教育	411
三、出国留学生和来华留学生	413
第二节 中等教育的发展	415
一、中等专业学校	416
二、普通中学	418
三、农业中学和职业中学	419
第三节 初等教育(小学)和幼儿教育、特殊	
教育的发展	420
一、初等教育(小学)	421
二、幼儿教育	424
三、特殊教育	427
第四节 成人教育的发展	429
一、成人高等学校	432
二、成人中等学校	433
三、成人初等学校	434

第五节 师范教育的发展	435
一、高等师范教育	435
二、中等师范教育	441
三、教育学院和教师进修学校	443
第六节 少数民族教育和妇女教育的发展	448
一、少数民族教育	448
二、妇女教育	462

附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学制图

国家教育委员会机构设置 (1987年)

第二十三章 新中国教育的起步与建设

(1949年10月—1966年5月)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经历了有史以来最重大最深刻的变化。1949年10月，新中国诞生在世界的东方。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伟大胜利，创建了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教育在全国范围内走上为人民服务的道路。这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时期，是从根本上改变教育性质的一个关键时期。

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前夕，这17年间，新中国教育取得了很大成绩，也出现过曲折。广大教育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进行过多种尝试，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认真地、实事求是地总结这一历史时期教育事业发展的历程和成败得失，对于推进当今的教育改革，有着极大的意义。

第一节 接管、改造旧教育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应当如何对待旧教育、旧学校，如何

建设适合自己国情的新教育，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创造性的工作，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

一、规定文化教育政策

（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确定的文化教育政策

新中国一成立，就明确了新教育的性质、任务、教育方法以及教育改造的步骤、重点。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就在这一天，毛泽东主席发布政府公告：中央人民政府一致决议，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

《共同纲领》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是全国人民意志和利益的集中表现。它在当时是全国人民的大宪章，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它是当代中国史上的重要文献。

在《共同纲领》第五章“文化教育政策”中明确地规定了新中国教育的性质、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

关于教育方法和改造旧教育的步骤、重点，《共同纲领》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方法为理论与实际一致。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

法。”

“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加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注重技术教育，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

《共同纲领》还规定了国民道德标准，这对培养新社会需要的新人有重要意义：

“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

我们能在新中国成立之际就迅速、及时地明确新教育的性质、任务、教育方法及教育改造的步骤、重点，这是因为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彻底完成民主革命，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恢复国民经济，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准备条件。因而，这一时期教育的基本任务，是为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服务，是在全国范围里继续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对于新民主主义教育来说，中国共产党在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种新民主主义教育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已开始探索、实践，经过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已有20多年历史，尤其在部队的政治、军事、文化教育，革命干部学校教育，农村小学教育，农民政治文化教育及干部在职教育等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早在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这篇光辉著作中就系统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和内容，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并具体地阐述了这种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的内容。

长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长期的根据地文化教育建设实践，使我们对国情及中国教育实践有比较充分的认识，因而使我们对新的教育方法以及新教育建设能及时地、准确地提出原则意见。

解放初，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进行比较充分、全面、科学的阐述，在宣传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上作出贡献的，有徐特立等教育家。

徐特立（1877—1968），湖南长沙县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教育家。他在多种社会形态和历史时期的艰苦复杂的环境中，从事教育工作长达7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是我国新民主主义教育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之一。解放初，他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任中央宣传部教育研究室主任。当时，他已年过古稀，但仍象过去那样热爱教育事业。1949年6月6日，发表《在教师节谈新民主主义教育》一文；同年12月，又撰写了《科学化民族化大众化的文化教育》文稿；1950年，在《河北教育》上撰文，用马列主义观点系统阐述了教育本质、教育对象等问题；在《人民教育》上发表《论国民公德》论文，对五项国民公德进行了科学的、具体的阐述，对宣传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目的、对象起了重大作用。1956年后，他因高龄，辞去了一切职务。他的一生除在教育理论上有重要建树外，还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教育了一代又一代青年，是我国人民十分敬仰的杰出师表。1968年因病逝世，终年91岁。

（二）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的建立

改造旧教育，创建新教育，必须建立新的教育领导机关和行政机构。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郭沫若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马叙伦、陈伯达、陆定一、沈雁冰为副主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的职责是：指导文化部、教育部、卫生部、科学院、新闻总署和出版总署的工作；对其所指导的机关和下级机关，颁发决议和命令，并审查执行情况。所以这个文化教育委员会乃是政府文化教育工作的最高指导机关。

同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马叙伦为教育部长，钱俊瑞、韦嫫为副部长。10月31日，马叙伦遵照中央人民政府10月27日关于结束华北人民政府工作的命令，接管了前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和高等教育委员会。^①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就是以这两个机构为基础建立的。

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举行成立典礼。从此教育部就成为政务院中管理全国教育工作的最高行政机构。当时教育部设办公厅、高等教育司、中等教育司、初等教育司、社会教育司、视导司和高等教育委员会、识字运动委员会等。

原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早在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后已由南京市军管会接管，档案、图书即由南京市教育局负责封存，原教育部职员作了妥善安置，大部分送往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南京分校学习。1949年10月28日，第三次政务会议通过《政务院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工作条例》，明确政务院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代表中央人民政府统筹指导与处理前国民党政府中央各机

^①1948年5月，原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边区政府开始联合办公，9月组成华北人民政府。董必武为主席，蓝公武、杨秀峰为副主席。华北人民政府辖河北、山西、平原、察哈尔、绥远等五个省区及北平、天津两市等。

关、人员、档案、图书、财产、物资等接收事宜；要求对原属中央系统各机关的旧工作人员进行调查研究，因材施教，合理分配；规定原属中央系统各机关的档案、图书、财产、物资等，一般应划归中央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各部门所有。1949年12月，原南京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的档案、图书及所存仪器设备，由中央派出的华东工作团进行了清理和处理，对有关人员作了妥善安置。至此，原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机构已彻底解散，不复存在。^①

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的成立，使新中国教育有了集中统一的领导机构，这对于贯彻、落实党和政府的文教工作方针、政策，改造旧教育，建设新教育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组织保证。而且由于首任教育部长、副部长人选适宜，领导得法，对于开创人民教育的新局面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马叙伦（1885—1970），浙江杭州人，著名的教育家，坚强的民主战士，忠诚的爱国主义者。早年，他目睹清政府极端腐败，国家内忧外患，萌发了革命思想，1911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时期，他是学生爱国群众运动的支持者，1921年曾领导过北京大中小学教师发起的、向北洋政府“索薪”的运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拥护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身体力行。“九·一八”事变后，积极进行抗日救亡活动。抗战胜利后，他虽已年逾花甲，仍奋不顾身，积极从事爱国民主活动。在国民党特务威吓面前，他表

^①有关接收、处理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详细情况，见教育部档案1949—1950年长期卷，卷7。